

彼得堡大學東方系與漢學家之學術活動

謝雷布里可夫、楊 頌* 著 陳相因、徐子芳** 譯

俄羅斯文化的先驅們向來對中國、中國文化和其精神生活的成就，展現高度的興趣。俄羅斯傑出學者羅曼諾索夫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 並非偶然地把學習中文列入自己人生計畫裏，他曾夢想能閱讀中國詩詞原文並翻譯成俄語，因為他本身也是一位知名的詩人。遺憾的是，疾病與死亡阻礙了羅曼諾索夫攻讀漢學的計畫。

普希金 (А. С. Пушкин, 1799-1837) 處於一個重視自己血脈¹ 和其他民族歷史的時代，而這是那個時代裏的精神生活特徵之一。十九世紀二〇年代中期過後，偉大的漢學家畢丘林 (И. Бичурин, 1777-1835) 在俄羅斯出版了大量的中國研究。普希金與畢丘林交好，認為自己有必要多認識中國，「為了畢丘林深入的見解以及竭盡心力的研究成果散發出如此耀眼的光芒，照亮著我們與東方的關係」。在普希金的私人圖書館裏，收藏了八十二份內容索引裏與中國相關且由俄語與法語寫成的著作。

托爾斯泰 (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在其精神與創作探索中，經常關注中國的哲學與文藝遺產，他並提及自己深受老子 (Лаоцзы)、道家與孔 (Конфуций) 孟 (Мэнцзы) 思想的影響。托氏的主要專題著作裏，有多達三十餘篇是關於中國哲

原文作 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таеведов，收錄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Китай: три века контактов.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м, 2006.- С. 289-295。在此感謝本文的第一作者謝雷布里可夫教授賜稿。

* 謝雷布里可夫 (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名譽教授。楊頌 (Р. А. Янсон)，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教授，曾為前者的學生。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徐子芳，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生。

¹ 譯者注：作者在此意指普希金有四分之一的血統來自非洲，這樣的血緣關係在詩人的身上是顯而易見的。許多俄羅斯或外國讀者常忽略的是，普希金其實有著有棕色的皮膚，捲黑的毛髮與較一般俄國人為矮的身高。

學、歷史、文化與文學等方面。普希金、托爾斯泰、別林斯基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車爾尼雪夫斯基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杜斯妥也夫斯基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 和契訶夫 (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以及其他文字藝術工作者，皆以其精神聲望盡心鞏固俄羅斯社會對中國人民、中國文化與文學價值的重視與關注。

一八一九年彼得堡大學歷史語言系設立東方文獻的部門，爾後在一八五五年九月更建立了東方系，並於其下設立九個研究室，其中包括有漢語與滿州語研究室。當時全俄羅斯最好的東方學研究者都在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任教。從創立之始東方系就認為系裏應該要有以東方語言為母語的研究員。為此，著名的東方歷史研究者格里戈列夫 (В. В. Григорьев, 1816-1881) 在《彼得堡大學創立五十年進程》(1870) 一書裏寫到：「東方系在彼得堡大學的創立，乃因歐洲其他大學沒有這樣一個系。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充分理由說，東方系也就僅能在俄羅斯成立。」

東方系自成立以來主要而明確的一項工作，就是培養專精中國語言、文化、文學與歷史且具有高技能水準的專家，並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與中國民族精神生活的獨特性加以研究。

彼得堡大學第一位創立起漢學學派的是瓦西里耶夫 (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一八八〇年他出版了歐洲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概論》，而以《佛教：教義、歷史與文學》和《東方宗教：儒教、佛教與道教》兩部分的研究成果最為著名。瓦西里耶夫的學生格歐爾基耶夫斯基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 教授則出版了《神話觀與中國人的神話》、《中國的生活準則》和《中國研究的重要性》等書。波波夫 (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 教授將《論語》與《孟子》翻譯成俄語，分別在一九一〇與一九〇四年出版。伊凡諾夫 (А. И. Иванов, 1878-1937) 是首位將研究聚焦於唐古特語與唐古特人歷史的學者，同時他也是研究「法家」學派和王安石改革運動的作者。

彼得堡大學的第二個漢學學派的形成與發展獲得高度的學術與教學成就，與俄羅斯研究院院士阿里克 (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 (或譯阿列克謝耶夫) 的名氣息息相關。幸賴阿里克的研究與其優美的翻譯文字，俄羅斯輿論界方能認識許多傑出中國作家的創作遺產。他更增強了研究美學價值的知識與對古代中國的認識，由此才能明白不同時代的文藝潮流與創作。阿里克多方研究儒家、道家與佛家思想對中國文化、詩詞與散文創作的影響。他的興趣包括戲劇、考古學、古錢、繪畫、辭典

編纂學與漢語象形文字拉丁化的問題，還有俄羅斯文學中文翻譯及散佈的歷史等。阿里克開啟了文本裏語言的分析，還有專業學術與藝術的翻譯等研究方法。阿里克還制訂了確切的漢學教育原則：「學語文而不學文化是不可能的。在這點上存在著一個整體的互動關係：學語文的目的乃為學習文化，因為只有掌握語言才能理解文化，或者說研習文化乃為學習語言，因為語言為文化之反映。」

中國古語與現代語最佳的鑑賞家是蘇次基 (Ю. К. Щуцкий, 1897-1938)，他將《易經》翻譯成俄文並（將之）註釋。

瓦西里耶夫 (Б. А. Васильев, 1899-1937) 教授竭力於總結和評述自遠古時代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性，藉由受到思想體系理論與民間藝術影響的特定歷史進程來定義，探討文學作品再現裏最至關緊要的特徵與獨特性。他是首位全面探索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曾出版魯迅 (Лу Синь, 1881-1936) 《阿 Q 正傳》的俄語翻譯。

斯梅卡洛夫 (Г. Ф. Смыкалов, 1877-1955) 教授為一位絕佳的教育者，他善於閱讀與闡釋古今不同風格（歷史的、法律的、學術的等等）的文本。

優秀的學者龍果夫 (А. А. 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 為研習漢語語法奠立學術基礎。他的研究成果《現代中文語法研究》(1952) 已有中、日、德語譯本。時至今日，他在語法理論、歷史語音學、方言學與漢語歷史的貢獻不僅對漢學家，甚至對所有語言學的專家而言都相當重要。

從上一世紀五〇年代開始，目前中國語文研究室裏的整體師資便已開始成形。雅洪托夫 (С. Е. Яхонтов) 教授，也是龍果夫的學生與繼承者，在質量上建立了自己的語言學派。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許多關於漢語及東南亞語系的優質研究。雅洪托夫的專題研究著作《漢語的動詞分類》、《古漢語》，還有其餘各篇不同而具有高度理論水平的研究論文，對於許多複雜難纏的語言學問題有獨創性的解釋。雅洪托夫多次參與國際會議，名聲享譽海外，他個別的專題著作書籍在中國大陸亦有出版。

倪基欽娜 (Т. Н. Никитина) 教授以研究中國先秦至漢代（西元前五世紀至二世紀）古文文本的語法馳名，她提供一種新的討論方式來切入句法學結構特徵的言語問題。

司格林 (Н. А. Спешнев) 教授多年（以試驗方法）研究漢語語音學，是一位出色的口語專家，也是俄羅斯最有經驗的教授與漢學家之一，其研究成果呈現於其著作《漢語語音學》、《漢語元音的聲學特性》。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司格林為俄羅

斯漢學家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民間文學，多年的研究成果完善地收錄於專題專書《中國民間文學：歌曲敘述體裁》(1986)。一九九〇年代司格林將研究注意力轉向中國民族心理學的問題，並將之相應地帶入教學過程裏。

自一九五〇年代後，始有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紮實研究。彼得羅夫(В. В. Петров, 1929-1988)對於詩人艾青(Ай Цин, 1910-1996)，還有關於中國新文學的奠基者魯迅所做的研究專書乃天賦之作。其內容資料豐富，探究這些大師們的藝術技巧、思想演變和創作知識等各方面特性。彼得羅夫有多部著作探索巴金(Ба Цзинь, 1904-2005)、曹禺(Цао Юй, 1910-1996)、老舍(Лао Шэ, 1899-1966)和郁達夫(Юй Дафу, 1896-1945)的創作道路。目前也僅彼得羅夫一人具有關於大量中國現代作家的稀有知識，能夠為《文學百科全書》完成關於這些大量作家圖書編目資訊的撰寫。

在東方系裏對於古典文學問題的研究工作仍持續進行。謝雷布里可夫(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教授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九八年主持中國語文系，是《杜甫：批評與圖書編目梗要》、《陸游的生活與創作道路》、《十、十一世紀的中國詩歌：詩與詞的類型》、陸游旅行日記《入蜀記》與范成大的《吳船錄》兩文全文俄語翻譯，並附書評與研究論文數篇。

瑪琳諾夫斯卡婭(Т. А. Малиновская)副教授研究中國古典戲劇，她完成了一本重要的學術著作《中國十七世紀劇作家：洪昇(Хун Шэн, 1645-1704)及其劇作《長生殿》，還有一篇學術論文《中國古典雜劇史綱要(14-17世紀)》。古薩洛夫(В. Ф. Гусаров)副教授鑽研韓愈(Хань Юй, 768-824)的散文作品。龐英(Пан Ин)副教授致力於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還在俄國及中國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探討長篇小說《紅樓夢》的手抄本。資深講師卡薩科娃(Л. Г. Казакова)戮力於中文教學法的改良，她和中國學者共同出版了一本中文教材，專為俄國大學高年級的學生而設計。

現今中國語文研究室中加入了許多新一代的漢學家。副教授史達洛茹克(А. Г. Сторожук)及羅季奧諾夫(А. А. Родионов)積極地參與教學進程，內容亦涵蓋語言實習與多元化理論課程。史達洛茹克著有《中國象形字導論》的基礎篇及專著《元稹：唐代詩人的生活與創作》。羅季奧諾夫是以研究教學取向為方法所著的《老舍的生活及作品》一書的作者，他和謝雷布里可夫教授及羅季奧諾娃(О. П. Радионова)共同發表《中國文學史指南(12世紀至21世紀初)》，另外他也是

《上海人》叢書的編者和翻譯者之一，中國作家想以此刊物紀念聖彼得堡建城三百週年。羅季奧諾娃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現代文學，她的副博士論文題目即是關於作家張賢亮的作品。吉拉西莫夫娜 (А. В. Герасимова)、明茲金娜 (Е. И. Митькина)，和札寧娜 (Е. Ю. Занина) 對於漢語研究工作成果豐富，更融合了教學活動與副博士論文的準備工作。

東方系亦廣泛地吸引了許多聖彼得堡學術機構，像是隱士盧博物館、俄羅斯科學院人類學與彼得大帝藏珍館 (Кунсткамера)、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部東方善本研究，以及俄羅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學院等的同行來此工作。

東方系盡各種可能地邀請專家學者前來。例如，著名的俄羅斯和蘇俄文學的行家與翻譯家曹靖華 (Цао Цзинхуа) 教授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在大學教授中文。自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初期，中國教師對於教學進程的組織提供莫大的協助。一九八五年後又重新開始邀請中文教授，自此東方語文學系會定期聘請中國大陸的教授前來。衷心感謝參與教學及研究活動的中國學者：北京語言大學的金曉靜 (音譯，Цзинь Шаочжи)、方平 (音譯，Фань Пин)、劉亮寧 (音譯，Лю Ляньи)、張敬詳 (音譯，Чжан Цзинсянь)、費清蒼 (音譯，Фэй Цзиньчан)、張寶明 (音譯，Чжан Баомин)、曹慧，以及北京師範大學的賈放、陳流方與其他人等。中國語文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及其附屬的華語中心也得到中國總領事館很大的幫助。中國總領事館第一時間回應研究室的所有需求，而領事館人員也積極訂定國際辦法、從旁支持研究室，並協助定期出版學術著作。

中國語文研究室及華語中心積極發起學術研究。每年研究室的學者會出版一至二篇學術論文以及三十篇左右的文章，探討關於中文各方面的議題。在對外華語的教學品質上，東方學系的華語中心被中國國家委員會評選為西北方學校中的第一名，並被授權舉辦對外華語能力測驗，此外還負責舉行《中國橋》(Китайский мост) 區域競賽。未來孔子學院也將設置華語中心，教導外國人學習中文。

近幾年研究室舉辦了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歐洲文學和亞洲文學的交互影響及翻譯問題 (紀念傑出中國文化學者、聖彼得堡大學榮譽博士——曹靖華誕辰一百週年)》、《遠東文學議題》、《民族傳統到全球化，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之路 (慶祝巴金一百歲壽辰)》。另外還與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合力舉辦定期的《遠東、東南亞及西非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九四九年成立了遠東國家歷史研究室，由艾菲莫夫 (Г. В. Ефимов) 教授領

軍，自那年起該研究室便已開始進行中國歷史的研究。艾菲莫夫教授的著作《新中國史綱要》及《最新中國史綱要》（1949 及 1951），被翻譯成日語、波蘭語及羅馬尼亞語，還有一部分被譯成中文。另外他還有一篇學術論文《1894-1899 年的中國對外政治》。艾菲莫夫教授出版了幾本關於辛亥革命的書，講述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在他的領導之下，學者開始廣泛研究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歷史文獻。他的學生斯莫林 (Г. Я. Смолин) 教授也帶領研究室長達二十年，研究中國上古及中古的歷史文獻議題。他有不少著作，而《中國十世紀下半葉至十二世紀初的反封建起義》即是他其中一篇學術論文。別列茲尼 (Л. А. Березный) 教授出過多本專書討論中國革命理論的議題，以及介紹一些分析中國十九至二〇世紀社會革命的美國當代文獻。達洛寧 (Б. Г. Доронин) 教授綜合多年的研究調查，寫成一篇學術論文《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歷史文獻及史料學問題》。諾維科夫 (Б. М. Новиков) 副教授的許多學術作品皆在探討中國秘密組織之一的《天地會》。薩莫洛夫 (Н. А. Самойлов) 副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十九至二〇世紀的政治哲學理論及中俄關係史。頓絲卡婭 (А. Е. Донская) 助教的論文是有關中國與自然災害的對抗。

近年來許多教授及學生前往中國見習。於當地大學裏研究中文、善加利用圖書館、和中國學者會面、在中國境內遊覽皆有助於系上教授改進教學方法，也能更廣泛地使用中國出版的對外華語教材，並開設更多新的專業課程，使學術研究工作更蓬勃發展。

聖彼得堡大學漢學家的學術研究及教學活動對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懷著最深的景仰，致力讓兩國之間更了解彼此。